

江淮之梦

万以学



引江济淮工程为淮河中游“解渴”（资料图）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三季) 征文

由省政协刘莉副主席带队,省政协民宗委组织委员去参观引江济淮工程。

我们从巢湖岸边派河口出发,顺着新开的引江济淮水道,车行约50公里,到了将军岭。

远远看去,小曹坊桥像细细的一条线,高高挑挑的,横跨在新开挖的河道上。在引江济淮工程全线130座桥梁中,它不过是其中的一座,论建设规模和复杂性,似排不上位,但它因将军岭而处在全线最高处,这是工程全线切岭最深、挖土最多的地方,它下切46.4米,口宽357米,在天地间形成了个豁然大口。介绍说,它也是目前国内挖深最大、等级最高的人工内河航道,两岸设计了7级平台和8级边坡。二级平台及坡顶还设计了6米宽的管护道路。

这将军岭其实是条长溜的土岗,其最高处在凤凰墩,一点也不高峻,名符其实是个土墩子。它一路逶迤下来,呈现着的是典型的江淮丘陵地貌。

但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将军岭是南淝河、东淝河的发源地,也是它们的分水岭,南淝河自此发源,然后过鸡鸣山,经董家埠、会大蜀山水,绕经合肥城,出施口,入巢湖。东淝河则自将军岭,在鸡鸣山与南淝水分行,折北而去,经廖家桥,过瓦埠、马蓝渡、东津湖等,绕经寿县城,至两河口入淮。秦晋“淝水之战”,即发生在东淝河上。

最重要的,将军岭还是江淮分水岭。之所以称为将军岭,据说是三国时吴魏

战争,此地必驻重师,将军之称,由此起也。民间亦有将军岭上将军开运河的传说。嘉庆《合肥县志》载,将军岭在城西四十五里。土人相传宋有将军欲开分水田,使二水相合,引淮入肥。募万夫挑之,工不成,后将军与工人约至鸡鸣时乃稍憩。忽山上鸡鸣而群鸡尽鸣,工人息,挑处复合,将军遂自刎。将军名亦无考。或又云隋炀帝时人。

这个传说何时开始流传已不可考。这位不知名的将军,奉命来此打通分水岭,使合肥接入东淝河,进而连通淮河。只是可惜,他出师未捷身先死,没有完成任务,最后只能以自杀谢罪。然而,这个传说也透露出一些信息。它反映了宋时甚至隋时南淝河、东淝河已互不相通的状态,也反映了江淮地区老百姓的渴望,即打通分水岭,将南淝河与东淝河连接起来,实现长江与淮河的联通。

站上桥来,俯视下去,人微微有些晕眩的感觉。而走下去,顺河道往前看,则楚天空阔,有豁然开朗感觉。

前方,引江济淮将接入东淝河,进入淮南(寿县)了。

二

我寻思,将军岭这个切口,为什么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主要是因为它打通了淤塞,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前景。

合肥与淮南(寿春),都属于江淮“棋眼”位置。《史记货殖列传》,称合肥为“南楚都会”。《汉书地理志》也说,合肥受南北潮,皮、革、鲍、木之输,亦一都会也。《史记货殖列传》还说,郢之后能寿春,亦一都会也。这“潮”字,或可解释为潮流、风气、风尚,两地交互影响,或可解释为湖、潮水,南是巢湖,北是芍芭,两地水系相连相通。这里的“都会”,应是指政治与经济中心,尤其是指经济较为发达之

意。在战国及秦汉时代,同在江淮之间的合肥与淮南(寿县),可以说是一对“双子星城”,并且不仅在江淮,当时在“国际上”也颇有影响力。但这两个城市之间有没有联系呢?有多大联系呢?

合肥距离长江不远,有南淝河接巢湖,通过裕溪口到长江。淮南(寿县)则有淮水之利。合肥距离淮南(寿县)虽近,若无水路接洽,全靠陆路车拉人拖“皮、革、鲍、木”,尤其是大宗物资如木材,真是难以想象。

三国时曹操在江淮用兵颇多。其中较大的一次,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》这么记载:建安十四年(公元209年),曹操在亳州作轻舟,治水军,自满入淮,出肥水,军合肥。建安著名文人王粲有《随军浮淮作赋并序》:建安十四年春三月,王师自谯东征,大兴水军,浮舟万艘。秋七月,始自满入淮,将出淝水,经合肥,旌帆之盛,诚孝武盛唐之狩。舳舻千里,不是过也。从王粲文章看,似乎那时东淝河、南淝河是相通的,而同时呢,吴国孙权水师则从濡须水北上,经巢湖,循南肥河攻合肥。曹操“出肥水”,这“肥水”应指东淝河,“出”是上岸骑马乘轿还是乘船继续前行呢?现在看,两种可能都有。他后来不在军帐中或马背上,而是在箬篷浦(今合肥杏花公园)的船上宴饮众将士,那已在南淝河上了。将军岭之东北方向至今仍有十里旱河,已经专家考证确认,那是“曹操运河”的遗迹。

由此可以想见,那时确实有可能江淮相通,合肥与淮南(寿县)承担了长江、淮河双枢纽的集散中心作用,才成就了他们各自的“都会”地位。但岁月变迁,沧海桑田,江山已失旧貌。清人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:“今水陆变迁,肥水故道,几不可问。”自唐以后,东淝河与南淝河隔绝,不再会合。东淝河下游不畅,中游雍滞,形成瓦埠湖。

也不难猜想,随着国家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向东南方向迁移,政治中心东移,输粮通道,转以京杭大运河为主。沟通江淮,唐宋期间尚有人提及,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关心了,彻底被废弃。从此此地,被东南经济中心边缘化,南北相争时期,此地又多为战场,或沦为战略缓冲区。

而沟通江淮,是江淮人民的亘古之梦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:于楚,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,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,于吴,则通渠三江五湖。沟及渠,都是人工河流的泛称。沟为战国时魏惠王十年(公元前361年)开挖。把黄河与淮河之间的济、濮、汴、睢、颍、涡、汝、泗、荷等主要河道连接起来,构成沟洫体系。这做了中游上半段的工作。这个体系,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受到破坏。邳沟,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,他利用长江与淮河之间湖泊密布的自然条件,就地度量,局部开挖,把几个湖泊连接起来,让淮河与长江在下游贯通。公元605年,隋炀帝疏通扩大了邳沟旧道以便通船,成为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是做了下游下半段的工作。而江淮地区,将军岭将南淝河与东淝河之间隔绝,其实也就是切断了安徽南北之间的联系。

这一阻隔,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,是合肥与淮南(寿县)的命运基本被圈定。在自然经济时代,水运无疑是保证繁荣的基本条件。大城市基本都诞生在大江大河沿岸,而有河流交汇的地方更受青睐,如武汉、南京及九江、芜湖、枝城等。在中部广袤的江淮土地上,包括大别山以东直至邳沟,一直没有什么大城市出现,构成了江淮中部凹陷的一个特征。解放时,合肥只是一个人口不过五万的小县城,远离了繁荣富庶,就是证明。不论在政治或经济版图上,“双子星城”不再存在,地位显著下降,被边缘化的命运似不可逆转。甚至军事地位也有所下降。除太平天国时,在江淮地区尚有几场知名战斗,其它朝代基本是一带而过。解放战争中,解放军淮海战役胜利后,很顺利地就解放了淮南(寿县)与合肥,并把渡江战役的前指设在合肥,并没有在江淮地区发生特别著名的战斗。

地理并不能决定一切,但其影响确实显著。相互阻隔的影响在皖南也能看到。在明以前,皖南条件并不比苏南浙东差,甚至比苏南条件还要好。但后来清朝时为保太湖流域,堵塞了芜申运河,切断了皖南与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。这是长江之外,之南的另一条东西大通道,经年日久,本是人为的隔断已像是“天然”的隔绝。只不过,因为有长江,皖南的变化相对缓慢一点,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。

三

沟通江淮,在新中国开始谋划,在新时期正式启航。

引江济淮工程,南起铜陵的菜子湖、西兆河双线引江,经芜湖、合肥、淮南、阜阳等地,直达河南,实现南水北调。其在

安徽境内涉及13个市46个县,覆盖范围5.85万平方公里。

在沟通淮河和长江的同时,它继续两头延长,与正在建设的合裕线、沙颍河、芜申运河航道相连。这意味着,它不仅改善安徽水运交通,构造立体运输网络,区域运输网络,也将根本改变原有的道路、水系,打破原有的社会生态、生活格局,改变江淮地区人们生产、生活的环境。在安徽的纵轴线上,将形成中国第二条南北向的长达1000公里的水道,与大运河平行。在这里,我觉得,引江济淮工程,可以考虑以“江淮大运河”来最后命名。

这是一幅无比壮丽的画卷:安徽原来的皖北、皖中、皖南三大块分隔的格局,现有一根粗长的金色脊线串连,安徽版图将从看不到“硬核”的枣状图,改为以引江济淮为经、长江、淮河及众水系为纬的骨架俨然,经络分明的金(寿)龟图。也可以将它看作是镌刻在江淮大地上的一个写意的人民币“¥”符号。

引江济淮作为水资源配置重大工程,并不单纯等同铁路、公路运输,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、生命需求完美融合在一起,极大地释放和增强江淮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。引江济淮全线贯通后,南淝河、东淝河、巢湖、瓦埠湖两大淡水湖泊,它们一是中国的五大淡水湖之一,一是安徽省的五大淡水湖之一。按徽州人的说法,巢湖与瓦埠湖自然成为了合肥的“水口”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长江与淮河,这历史上一直享受帝王祭祀的“四渎”之二,变成了合肥的左右川流。“合肥”的意思也将得到充实,或将真正名至实归,它将汇长江、淮河、巢湖、瓦埠湖之利,并借助淮河和引江济淮工程,“合”东淝河、南淝河、西淝河、北淝河四条淝水之“淝”,真正成为“合肥”。肥,多肉也。今人谓富饶,古人谓肥饶。如此之多“肥”组合,想不肥美

也不行啊。《尔雅》释“肥”之义,应当给予重新解释。古人讲,“四美具,二难并”。当今世界最紧缺的三大战略资源,即人口、水和能源(煤),将在江淮地区叠加在一起。其地缘,在做好生态保护前提下,将是各类项目进入的最好场域,是布局重大项目的绝佳之地。举目看去,不仅在中国,就是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“如此美好”的地方。这将使江淮地区成为长三角的坚强后盾,而不是拖累,成为祖国雄鸡“有温度的”温暖腹部,而且是有坚韧腹部的腹部。

当然,还有文化。安徽三大块地理上连成一体,更易于形成相同的生活方式、协调的生产方式和和谐的生存方式,会催生和形成诸多不同的文化要素,进而唤醒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,形成安徽人对安徽文化的新认同。这不是什么不能承受之重。引江济淮终将作为历史,我相信它会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,精神象征,时代烙印,与历史记忆。

四

所谓经天纬地,莫不过如此吧。

随后,我们来到引江济淮溧河总干渠渡槽。这渡槽主跨110米,是世界上主跨最大的钢结构通航渡槽。渡槽总用钢量高达2.04万吨,上跨江淮沟通段河道,连通被引江济淮河道分开的溧河总干渠,两航道高差约30米。上下均可通航,通航,是名符其实的“水上立交桥”。

我觉得这“立交桥”充满象征和隐喻。淮上与江南,水上与陆上,经济与民生,现在和将来,现代与古代等等。不妨在小曹坊桥和渡槽选择好位置,设立个观景台,将来让游客,各个自己去补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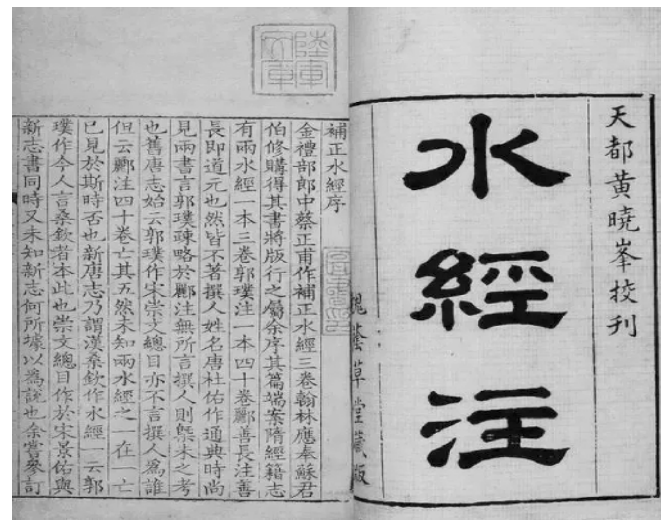
省政协常委、合肥开福寺方丈圆藏说:“震撼”,他写了一首诗,兹录于后:大禹治水万古传,引江济淮功盖天,车船齐驱非梦幻,福泽群生谱新篇。



引江济淮壮美风光

吐川纳淮话潘溪

祁家录

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 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 (第六季) 大型征文

行走在淮南淮河大桥北首,转向向远东望,可见淮河大堤下,有一块晶亮的水面,在绿树的辉映下,波光粼粼,像似系在淮河上的一块美玉。这就是古称潘溪的卢家湖。

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云:“淮水又历城南置潘溪,戍东侧潘溪,吐川纳淮。”清嘉庆《凤台县志》载:“潘溪即今县东北境淮北岸卢家湖,地淮滨,环岗三十余里,岗夹成溪,积汇成湖,曰卢家湖,湖东南出口,曰卢家沟注入淮,沟西二里大岗上,即古潘城,潘溪戍处。”清光绪《重修凤台县志》称,潘溪即卢家湖地,中亘三岗,岗夹成溪,两溪源有泉,南流终岁不竭,两溪无泉。四溪南流汇为湖,由湖东南卢家沟注入淮,沟西二里岗地,即古潘城。1997年出版的《淮南水利志》记载:“今卢家湖有四沟(溪)南流入湖,中夹三岗,但无泉,17.5米水位,相应水面0.4平方公里。”从史料记载看,皆认定卢家湖为古潘溪,有溪水长流的风光,有吐川纳淮的气势,同时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发生了变化。

潘溪改为卢家湖的称谓,与淮上移民有直接关系。明代山东卢姓族人迁至淮河边,在潘溪东侧落户定居,靠湖吃湖,边耕作

边捕鱼虾,以后人们就称这水面为卢家湖,称入淮口为卢家沟。过去卢家沟的地名在淮上很有名气。

清末,出生于潘集区夹沟镇范庄的徐州总兵陈凤楼,视卢家湖为一块风水宝地,将自己的墓地选择在湖边高阜。陈凤楼咸丰十一年投军,同治六年转在刘铭传麾下,因有功升为参将,官至记名提督、徐州总兵,曾在家乡赈灾,并捐建了尹河石桥,民间称为“陈桥”。陈凤楼卒于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享年76岁,他在当地留下很多传奇故事。

卢家湖虽为风水宝地,但在历史上同沿淮很多湖洼一样,饱受洪灾之苦。民国时期黄水入淮,多年为患,湖中淤泥沉积,湖畔村庄、土地被淹。建国初,党和政府就发出治理淮河的号召,修筑的淮北大堤从卢家沟穿过,堤下建涵洞,阻止淮河水进入卢家湖。后为确保大堤安全,将卢家沟村庄拆迁,在湖东侧规划建设起农民新村。

同时,为了解决内涝洪水灾害,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,经过多年谋划争取国家投资兴建卢家沟枢纽,全部工程到1999年基本竣工。从泥河到卢家湖开挖引河7.5公里,引泥河水入卢家湖;在卢家湖南侧安装机组4台套12000千瓦,流量120立方米/秒。这项工程改变了卢家湖的历史,湖水由自然调解转变为人为控制。枢纽管理区从湖边到淮北大堤,绿树成荫,花草溢香,成为湖畔休闲观光的好去处。

卢家湖的风光美在湖水。湖水滋养自然生态,杨柳、菱藕、飞鸟、鱼虫等,尽显风采,如织如画。湖水更是周边发展农业经济的宝贵资源,湖畔发展蔬菜四季常青,一排排大棚与湖水辉映。严冬白雪皑皑,本地的特色菜黄心乌,大面积收获,吸引省内外客商到湖边采购。

随着新时代经济发展,卢家湖周边由单纯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、商业多元发展。由此,周边环境更加壮丽可观。铁路、公路、堤顶路从湖畔穿过,来往车辆如梭,发电厂一个个高大的烟囱上,白雾入棉,随风伴云;为了安置煤化工园区建设搬迁的农户,地方政府在湖畔建起连片农民新村,一座座高层楼房林立,气势宏伟,可与城区大厦媲美。再看临近的农贸市场,商品丰富多样,人流车水马龙,一派繁荣景象。

记得,上世纪80年代,平圩镇初建之时,我采访镇主要领导,他向我展示出一幅平圩地区规划图,在卢家湖上标为“淮上公园”。30多年过去,这样的精心设计和美好愿望,依然留在纸上。现在想来,建设美丽乡村,发展沿淮旅游经济,要是能在卢家湖开发景点,也可谓锦上添花。当然,这也是空谈。要把空谈变为现实,还要等有能力的有识之士出手。

楚文化对汉文化的文脉传续和历史影响

楚仁君

楚文化大家谈 征文

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

在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,楚已逐步发展为兵强马壮的华夏大国,一跃成为“春秋五霸”和“战国七雄”之一,无论是从疆域控制区域来看,还是从文化覆盖范围来说,楚国已是名副其实的“半天下”。秦、楚是当时两个最为强盛的大国,虽然楚国最终在寿春(今寿县)被秦国所灭,但是最后灭秦的还是楚人,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并非虚言,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皆出自楚地,如陈胜建“张楚”,项梁立怀王,项羽尊义帝,均是举楚之帜以灭秦。汉高祖刘邦及西汉功臣集团,也多出自故楚之地。因此,西汉时期的楚文化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复兴,对汉文化的形成、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。丰富灿烂的楚文化,对汉代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等,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催生和促进作用。

楚文化对西汉物质文明的影响,表现在对文化传统的承继上。东周时期,我国南方形成几支不同的文化系统,即:江汉平原的楚文化区,长江一带的百越文化区,江淮地区的汉阳诸姬文化区,淮河南游的群舒文化区,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区等,各区域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点。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楚国向四周的扩张,楚国文化逐渐统一了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,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烈的影响。汉淮南诸国原本属于周文化系统,至春秋中期开始逐步楚化,融入楚文化之中;淮河南游群舒文化系统在春秋晚期也渐变成楚文化;长沙地区的百越文化到战国早期也变成楚文化范围。战国时期楚文化对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,对峡江地区及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都有强烈的影响。从考古学文化看,淮河流域西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多传统楚文化因素。二十世纪60年以来,考古人员相继在寿县刘安家族墓地周边发现陆野刘家孤堆、黄家牌

坊孤堆、寿春镇计生服务站等一批西汉时期墓葬,无论是棺形制,还是随葬品的种类,都表现出楚式风格,带有浓厚的楚国丧葬礼俗特点,充分说明汉文化继承了楚文化的传统。

楚文化对西汉精神文明的影响,体现在对民俗习惯的承袭上。楚文化所体现的楚人的思想意识、道德观念、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等,对汉代的精神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西逸《楚辞章句》云:“昔楚南郢之邑,沅湘之间,其俗信鬼而好祀”;《吕氏春秋·异宝》曰:“荆人畏鬼”;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:楚地的民“信巫鬼,重淫祀”。有研究者指出,楚人对鬼的崇拜有四个突出的表现:一是遍设鬼祠;二是尊崇厉鬼;三是隆祀国殇,称为国而死的人为鬼灵、鬼神;四是祈求先祖,希望借先祖鬼灵的力量来庇佑生者。楚国遍设神祠、隆祀鬼神的祭祀文化对西汉有着深厚的影响,可以说,西汉时期的道教信仰、祭祀礼俗等多承袭于楚制。汉武帝时开始祭祀神界最高主宰“太一”,也是借用了楚地的道教信仰。西汉时期承袭楚国的丧葬习俗更是非常明显,楚国丧葬中招魂的礼俗也为汉代所继承。

楚文化对西汉政治文明的影响,显示在对政治思想的承接上。东周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,也是各种政治思想最为活跃时期,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学派,出现了百家争鸣之势。山东鲁国地区有孔孟学派,是儒家学说的发祥地,儒家阐述伦理道德,主张仁义德治。中原三晋地区产生了法家学说,强调法制而力主耕战,秦国吸收了法家思想而大力推行。长河、淮河流域的楚地则流行老庄思想,形成了道家学说。道家学说之所以发源于楚地,与楚地的社会背景、文化观念等有着直接关系。老子、庄子都是楚地人。《楚辞》《山海经》中充斥的神怪,楚地出土的各种看似神怪之物,都体现出对自然之物加以神化,并且是在进行变化的。这是道家之所以产生了楚地的社会文化背景。汉王朝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,遵从黄老之学,采用“无为而治”“以民为本”的政治主张,稳定了社会秩序,恢复和发展了经济生产,促成了“文景之治”盛世,也成就了汉武帝时期的繁荣和昌盛。